



我和老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和老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和老师

本社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开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 / 32 印张 8 插页:3 字数:170 千字

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8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0 本

ISBN7-5617-0102-0 / G · 045

统一书号: 7135 · 241 定价: 1.85 元

金縵曲

敬獻人民教師

不用天涯覓。論英雄。教師隊裡眼。
前徑呈。歷盡艱難。誰曾不悔。只是許。
身孺子。堪回首。十年往事。元怨无
尤。君折齒。掉丹心。默向紅旗祭。
忠為愛。無倫比。幼苗茁壯園丁喜。

人知平时辛苦，晚眠早起，燥湿寒
湿，萦与猝都立心，頭眼底費盡了。
千方百計，他日良材承大厦，賴今朝
血汗者，滴无和熟，無窮際。

元十九年一月作。故值年九月

十日教師節錄以志慶況。

元六年秋

趙様初



写在前面

没有老师，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人们尊重老师，因为他们的工作关系到民族的兴衰，他们的工作在社会的文明进步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老师热爱学生，也正因为他是把学生看作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是人类文化的继承者，发扬者，并且以培养莘莘学子为乐。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老师，这个世界既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更没有未来！

苏步青教授曾说：有人把教师比为红烛，有人把教师比为园丁，这都还不够恰当。红烛燃尽，它的光亮也就熄灭了；园丁培育花朵，也只不过供人观赏。而教师的业绩却是继往开来的；他们的学问、技术，将为学生传下去，他们培养的人材，将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输送一批批生力军。在社会进化的长河里，教师的影响是深远的，教师的功绩是永存的。这是多么确切的概括！诚然，教师的艰辛工作，并不完全为社会上所有人都理解和尊重；为人师者，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工作的崇高价值和伟大意义。然而，教师，毕竟是令人尊敬的称号

呵！

我们正是为了增进人们对教师工作的理解，并表示我们对老师的敬意而编选这本集子的。

选入本书的文章的作者，有国内各行各业的同志，他们中有白发苍苍仍勇攀高峰、猛攻难关的科学工作者，有年逾花甲仍跟随老师创新创业的教育家，有才思敏捷精力充沛的中青年学者、作家，有技艺惊人的体坛小将，有风华正茂的英雄战士……。年高的已有八、九十岁，年轻的才二十余岁。他们的老师有的早已作古，有的还意气风发地在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在编排中，我们以作者的生年为序，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某某学生对某某老师的怀念和自己身受的教益，还可以看到几代学子成长的道路，几代老师对社会的贡献，几代师生之间的关系。从 20 年代到 80 年代，这里有一个时代变迁的轨迹，这也不能不从师生关系上反映出来。但不论怎样，我们总可感到“尊师爱生”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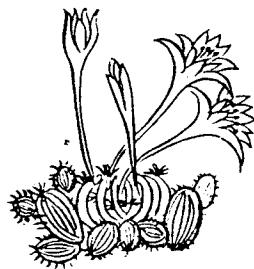
正和实际生活中的情形一样，我们这本书中也反映了一些虽为人师而犹有不足的情况，这就涉及到该怎么教，不该怎么教的问题。同一教师，教授了许多学生，有的成就很大，有的却无所得益，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善于学和不善于学的问题。是故，不论教师或学生，都可能从这本小书获得一些启发。这对发扬我们“尊师爱生”的传统，也许不是无益的吧！

承作者的大力支持，在百忙中为我们撰写了这样深有感受、充溢挚情的文章，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有几篇文章是从书刊上选出来的，收录时略略作了些改动，在这里也

谨向原作者致深切的谢意。此外，在组稿过程中，我们还得到解放日报王世勋、文汇报陈根宝、余仙藻同志及上海团市委俞健萌、龚海峰同志的热忱帮助，均此致谢。

编 者

1987年5月1日



目 录

金缕曲——献给人民教师.....	赵朴初
1 写在前面.....	编 者
1 纪念我的老师竺可桢先生.....	胡焕庸
9 怀念李大钊老师.....	程俊英
16 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吴师.....	万云骏
23 怀念我的老师.....	苏步青
28 老师与我.....	王朝闻
37 难忘寄园情.....	谢稚柳
42 人生道路上的最初向导.....	陆 治
48 遥远的怀念.....	季羡林
57 追忆先师余先生的教人方法.....	张舜徽
61 美好的记忆,深刻的怀念.....	朱 雯
68 亲爱的母校,尊敬的老师.....	钱学森
74 长忆老师的拳拳心意.....	李春芬
79 老舍先生和我这个学生.....	徐中玉
88 在我从事影业的道路上.....	桑 弧
93 老去情亲旧日师.....	陈从周
98 学前的老师.....	叶至善
103 我的两位先生.....	王玉润
109 我的老师.....	魏 巍

115	吾爱吾师.....	谢晋
123	建设社会主义要靠真才实学.....	章开沅 ——怀念我的老师杨东莼先生
131	跟随老师创新创业.....	陈钟英
137	共同事业中结下的深情厚谊.....	张岂之 ——记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
149	乡村塾师.....	陆文夫
156	老师——受人尊敬的称呼.....	陈中伟
162	从记忆深处升起.....	于漪
167	崇高的理想，严谨的作风.....	林栋梁 ——我的良师周志宏教授
173	老师的拼搏精神传给了我.....	胡之璧
179	严师门下.....	刘绍棠
184	我的恩师叶百丰先生.....	陆继椿
194	春雨润物细无声.....	徐孝鱼
200	师道.....	张抗抗
207	一份特别的请柬.....	陈燮君
214	胜利的获得不是偶然的.....	聂卫平
222	他们给予我夺得世界冠军的实力.....	张爱玲
230	铭记老师无私的业绩.....	张川
236	在李冷冷老师的温暖爱抚下成长.....	史美琴
242	柯老师教我握横拍.....	何智丽

纪念我的老师竺可桢先生

胡焕庸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我国，强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庚子条约，我国处于危急存亡之秋。1901年我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私塾先生的家庭；刚满20个月，我父亲就因病去世。母亲含辛茹苦，以缝纫为业，扶养我长大。她希望我将来也能成为一个教师，继承父业。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进入常州中学。这个中学的校长童伯章先生正是我先父过去的老师，同时还有陆殿扬先生担任教务主任。常州中学在当时是东南各省中一个比较著名的学校，全校数、理、化以及外国史、外国地理等科目都用英语教本，这在全国中学里都是少有的，历届学生的成绩也比较优异。1919年，正是我国拒绝签定巴黎和约的时候，全国兴起“五·四”运动。常州是一个中小城市，但也激起了罢学罢市的风潮。对我来说，当时也是一个关键时刻：根据我的家境是难于升入大学的；但我个人的志向和家庭的期望，还希望能升入大学。正在彷徨之际，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正在招生，这个学校免收学、宿、膳费，自己所支付的费用不大；我就鼓足勇气，报名投考。大约每十个人能录取一个人，我由于中学时期学习扎实，自己也勤奋攻读，竟然能被录取；这样就使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争取当一个合格教师。

清末提倡开办新学，南京最先成立三江师范学堂，作为东南最高学府。民国以后，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内分文、史、地部，数、理、化部以及农、工、商、教等专修科。我考入文、史、地部。1920年竺可桢先生来南高任教，同时学校正筹备扩建。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为东南大学，竺可桢先生任地学系主任。竺先生在美国留学多年，先在伊里诺斯大学得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气候和地理、地质，得博士学位。当时建立的东南大学地学系，内分地理气象和地质矿物两个专业，他延聘专家担任地质矿物教授；他本人担任气象气候和地学通论、世界地理等专门课程。建立气象测候站，还成立岩石、矿物和古生物等标本室，充实内容。他亲自率领助手，每日观察气象，出版南京气候月报、年报，同国内外有关方面互相交流。他所开的地学通论课程相当于目前的自然地理概论性质，不仅是地学系学生必读课程，同时也为理科、文科必修课程，每年开讲，听讲学生在百人以上，有竺先生编写的铅印讲义。竺先生讲授气象学也编写讲义，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竺先生的世界地理教材，包括自然与人文两部分。在人文方面，特别联系各国时事与国际关系有很多的统计资料；他还曾写过《欧洲战后之新形势》（《史地学报》1卷1期，1921年）和《欧洲之现势与将来之危机》（《东方杂志》18卷9期，1921年）等文；并指导选习世界地理的学生分别从

中、英、日文报刊摘录中外地理与各国政治、经济资料，经他审校编次印成《地理新资料》。此外又指导学生翻译鲍曼《战后新世界》一书，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竺先生的科学工作以气象、气候学为中心，特别着重中国气候的研究。他一生的著作，亦以这方面为最多。他留学美国，从1916年开始，曾先后在美国的《每月天气评论》，《地理学评论》以及我国留学生所办的《科学》发表了《1900—1911年中国的雨量》、《1911年夏中国台风的分布》、《中国在气象学上的贡献》等论文。他在创办东南大学地学系之初，即购置各种气象测候仪器，设立南京气象测候站。1922年写成《南京之气候》一文，发表在《科学》7卷3期。以后又根据新取得的资料，进一步分析研究，重行编写，以相同题目先后刊载于1922年的《史学与地学》第四期，以及1932年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的南京》一书中。竺先生设立南京气象测候站，研究南京气候，这是他气象、气候工作的开端。当时全国仅有十几个气象站，而且全在外国人掌握之中。竺先生特别关心建设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气象事业。1927年他筹建气象研究所，1928年他在中国气象学会会刊上发表《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屡述气象在农业、航海、航空和水利中的作用。他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是与科学、生产、建设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竺先生不但很重视室内实验，也很重视野外考察，他经常率领学生在南京附近进行野外实习，考察岩石性质、地质构造、地形发展、土地利用等现象，与讲课内容互相印证，借以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的能力。

竺先生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期，就坚持每天记日记。天气与物候是每天观察记录从未间断的内容。日积月累，便成为有价值的科学资料。《南京之气候》、《杭州之气候》、《论新月令》、《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等著作》，便有不少资料是由此而来的。

1923年6月，我在南京高师毕业。由于竺先生的教导，我对于新的科学地理学，以及气象气候学等已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和比较坚实的学习基础。当时我已经怀有继续出国深造的心意，为了取得必须的经济准备，我当时就应扬州中学之聘，担任史地教员。1926年秋，我同几个知心朋友互相资助，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继续向当代名师德马东、德孟维和吉纳等教授求教，对于法国学派研究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内容和方法，得到较多的认识。于1928年秋回国，受竺先生之聘，一方面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过去东南大学的改称，不久又改名中央大学，也就是解放以后南京大学的前身）地学系任教，同时竺先生正在南京北极阁创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他聘我担任研究员兼秘书。

竺先生从1927年以后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客观条件非常困难，不但为该所建筑所址、购置设备、延揽和培养人才而披荆斩棘，备历艰辛，同时在国内各地增设气象站，任务尤为繁重。赖竺先生及其领导下的人员以异乎寻常的毅力，坚定不移的决心，克服重重障碍，终于规模初具，大改旧观。与以往测站寥寥，而且全操于外人之手的情况，别若天壤。

竺先生既是一个气象学者，也是一个地理学者，他的著

作，以论述中国气候的为最多。在 20 年代以前，近代气象学与近代地理学在中国还处于萌芽时代。竺先生担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期间，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材。竺先生主持气象研究所期间，集中了许多气象专业人员，研究和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气候的专门论文和丛刊，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台风、季风、中国气候要素、中国气候区划以及中国气候的变迁等等。这些既是气象气候学上的重要成就，也是科学的中国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竺先生创建气象研究所起，十年惨淡经营，基本确立了中国气象、气候学的科学基础。帮助竺先生完成这项事业的有张宝坤、吕炯、沈孝鳳、黄逢昌、黄夏千、郑子政、涂长望、赵九章、卢鑒、朱炳海、诸葛麒、叶笃正、陶诗言、顾震潮、高由禧、朱岗昆等，其中大部分是东南大学和以后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

我在气象研究所兼职，只有一年时间。1929 年秋，竺先生离开中央大学在气象研究所专职任所长，我也脱离气象研究所在中央大学地学系专职担任教授。当时是郑厚怀教授担任地学系主任。1930 年正式成立地理学系，我被任为主任。系内设地理和气象两个专业，当初我主要担任地学通论、气候学和世界气候等学科的教学工作。张其昀教授担任中国地理教授；新聘黄国璋教授任经济地理学和美洲地理等课程；以后又继聘奥籍教授费师孟担任地形学和欧洲地理等课程；朱炳海先生不久也从气象所调来地理系担任气象学和中国气候等课程；毕业生徐近之在建立拉萨气象台后回到地理系任教，教师阵容相当完整。不幸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从 1931 年侵占我

国东北，不久，步步进逼，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央大学也被迫迁往重庆。

1936年，竺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校长。接任后即设立史地学系。先后任教该系地理、气象、地质方面的教师有：张其昀、叶良辅、朱庭祜、涂长望、任美锷、黄秉维、卢鑑、么枕生、李海晨、严德一、刘志远、王维屏、李春芬、严钦尚和陈吉余等。1939年秋又设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培养研究生。至1947年止，在地理、气象、地质等方面大学毕业生共74人，研究生得硕士学位的20人。在解放前是培育这些学科人才的一个重要中心。浙大不仅在地理气象等领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出版书刊，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如1942年开会纪念我国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宣读论文，出版专刊，就是一个例子。

解放后，浙大史地系地理部分于1949年8月独立成为地理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浙大地理系一部分人员和设备并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地理系；一部分人员和设备并入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改组为杭州大学地理系。推本溯源，这两个大学地理系的建立，竺可桢先生实是有力的奠基人。

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气象学会是与竺先生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学会。1932年，竺先生在《方志月刊》上发表《中国地理学会发起旨趣书》。1934年4月，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推选翁文灏为会长，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黄国璋、王益、张印堂、张星烺、董绍良、翁文灏为理事。《地理学报》创刊号旋即出版。竺先生前后在学报上发表了《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中国气候之要

素》等重要文章。

解放后，竺先生一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先后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地理讨论会开幕词》、《纪念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逝世100周年》、《1960年全国地理学术会议总结》、《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等文章。又在该会出版的《地理知识》发表过《目前中国地理研究工作的任务》（1950年）、《中国地理学工作者当前的任务——中国地理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3年）、《地理工作者应该是向地球进军的先锋》（1958年）、《论南水北调》（1959年）、《1960年全国地理学术会议总结》等重要文章。

竺先生认真攻读、努力写作，几十年如一日。在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正值抗战，学校辗转内迁，历尽艰苦，但他继续从事教学，提倡科研。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称誉“浙大是东方的剑桥”。竺先生主持浙大期间，不仅重视学术研究，尤其重视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在国民党当局迫害浙大的教授和学生时，竺校长挺身而出，与国民党当局奋力斗争。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竭尽全力，争取竺校长前往台湾，竺先生坚决拒绝，留在大陆。党和政府看到竺先生热爱祖国的高风亮节，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先生欣然接受，历时二十多年。他主持和参与的工作跨越许多学科；生物学、地学一直由他分工领导，他还兼任综合考察委员会、国家大地图编纂委员会、中国自然区划委员会的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工作尤其艰巨复杂，考察地区包括青藏高原、西北西南各省、黄土高原、黑龙江流域以及南方热带各地，前后组成十几个规模宏大的考察队。